

# 守望 牧職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 2398-1699 | info@hkci.org.hk / www.hkci.org.hk

第3期2021.5 ■ 督印人：龔立人 ■ 主筆：何嘉衡

03

## 記憶所繫之處<sup>1</sup>

何嘉衡  
研究及出版幹事

香港社會一直以來給人「不善於記憶」的印象，當然，問題不一定出於香港人，也可以在於政府；許多能夠代表這個城市的人、事、物，都可以在一夕間自動消失或是被消失，甚至連香港人以為能夠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也可以在走到一半的時候結束。不過，不知由什麼時候開始，香港人慢慢在意那些「被消失」的東西，因而不少社會事件都環繞如何保留人們熟悉的香港而發生。2000年開始，維多利亞港<sup>2</sup>、囍帖街<sup>3</sup>、皇后碼頭<sup>4</sup>、菜園村<sup>5</sup>等相關的保育討論與抗爭，最後均以失敗作結；但不得不承認，每次發生保育和保留記憶相關的社會事件後，就會有更多香港人開始關心保育和保留香港歷史與記憶的議題。從過往被指只是「殖民地」、「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到歷經多年的保育抗爭，到2019年及其後發生不少事件直至現在，不難發現香港人變得愈來愈在意如何保存「香港」以及相關記憶，也更因為想要保留香港而發展出「香港記憶」和「香港意識」。

不過，「記憶」本來就很難界定和討論，由研究人腦如何記憶及其機制的神經科學，討論記憶意義與價值的哲學，使用不同記憶和討論人類為何記憶的歷史學，利用自身記憶創作的文學，甚或討論基督徒為何需要記憶的神學；實在有太多學科和研究範疇都與記憶相關，根本不能盡錄。如果還要討論「對一個地方的記憶」，勢必會變得更加複雜，因為當中少不了與政治、社會、文化等議題相關的討論。

基於探討記憶是太龐大的項目，故此必須將範圍收窄，在多番考慮後，筆者希望將本期《守望牧職》內容集中於探討人們能如何記憶香港；亦以「記憶」為題，探討「記憶香港」可能對香港教會帶來的影響。再而是這個過程可能會怎樣受香港人或是其他外來力量影響，希望能讓讀者更能夠意識到「記憶所繫之處」的重要性和其脆弱之處；同時也能帶來反思，甚至能為身處香港的各位帶來面對更為晦暗不明的未來的一絲力量。

## 一 | 當我們想討論「香港人的記憶所繫之處」，是討論什麼？

雖然本文借用了「記憶所繫之處」來命題，但筆者並非想要從它原本的意思來討論香港，又不是要用一篇文章來證明香港是個「記憶所繫之處」；反而是想討論香港人為什麼會記憶香港，也討論為什麼記憶香港在此時此刻顯得特別重要。人文地理學家 Cresswell 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sup>6</sup>一書中，以人文地理學的角度分析「地方」（place）作為「概念」的重要意義。他指出：「我們很容易指稱鄰里、村莊、城鎮和城市是地方……不過地方也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們把世界視為涵括各種地方的世界時，就會看見不同的事物。我們看見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依附和關連，我們看見意義和經驗的世界。」<sup>7</sup>

同樣指涉特定空間，「地方」(place)與「空間」(space)兩者雖然具有相似意思，但Cresswell以及其他人文地理學學者其實都嘗試將兩者作一定區別。簡單來說，「地方」重於表達一地與在其上生活的人之間有機而且複雜的相互影響；而「空間」則是更「科學化」的嘗試去表達和歸納特定空間。為了讓數據及理論得法，所以必須將最難以理論化的「人」去除，因此「空間」比起「地方」是更抽象而且理論化的概念（從而符合某種自啟蒙時代開始對於科學的定義與想像——更客觀及具有普遍性）。行文至此，相信讀者們都能理解，筆者絕對會在本文中將香港定義為一個「地方」，甚至可能是香港人的「記憶所繫之處」；因為香港對於生活在其中，甚至以香港為家的人們來說，就是具有特殊意義，與別不同的地方。

「地方」之所以特別，絕對不是因為那是在世的天堂，有讓人樂而忘返的特質；有些地方可是充滿壓迫，人活得毫無尊嚴。地方之所以會成為「地方」，是因為人們生活在其中和經驗過的一切，是能夠／已將感情投放，也是因為生活在這地方的人們之間彼此有關係。簡單而言，某地之所以能成為人們記憶、在意、珍視的「地方」，是因為人與那地有關係，並且視之為自己生命經驗的一部分；那份人與地方的關係會令人覺得那地方獨一無二，不會跟世上其他任何空間相同。不過，由於地方成為「地方」是因為人們在該地活動和實踐，創造出獨特的生活經驗，並使其具有特殊的意義；所以地方並非一個「固著」的存在，而是會在人們生活和實踐的過程中不斷改變，所以Cresswell指出「地方從未『完成』，總是處於『流變』。」<sup>8</sup>

或者有人會質疑，香港人只是經濟動物，香港只是一塊殖民地，甚至連香港的時間也只是「借來的時間」，怎可能有人視香港為「地方」？可能在九十年代這樣的質疑仍然是合理的，但不論左、中、右的論者都在近年發現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已經與九十年代，或是以往有截然不同的轉變。

歷年關於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變化，可能已經有非常多的論述，散落在心理、情感又或是流行文化、文學、影視作品等等。而最「實在」的例子可能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後來從香港大學獨立出來，成為香港民意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兩者在近十多年來一直進行的香港人身分認同民意調查及其結果。<sup>9</sup> 從兩者相關的民意調查數字都可以發現，歷年來受訪市民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雖有起伏，但明顯自2008年起，更多香港市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2019年底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民意調查中，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非其他身分的市民，更是達到歷年統計數字的新高，超過一半受訪人士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當中更有高達八成是18-29歲的青年。<sup>10</sup> 從這些數字可見，香港人已經慢慢建立出與過往不同的身分認同，意味香港人對「香港」這個地方有不一樣的感覺和重視。

除了民調數字，從生活層面也不難看到近年香港人對「香港」的重視，例如筆者在開首提過的數次保育運動。雖然就結果而論，這些保育運動都以失敗收場，但是又的確使不少香港人開始重視保育。直到近年，例如北角的皇都戲院或是窩仔山的配水庫，都是目前有望可以保留的古蹟。另外，香港人比以往更為關心本土產業發展，例如流行文化、社區營造、農耕和本土食物；甚至有商人看準部分香港人願意支持香港產品而開展的銷售模式<sup>11</sup>，而支持這些產業的消費者，不少是包括筆者在內的「文青」，又或是20至40歲的新一代香港人，可見近年香港人是更努力嘗試保存或建立具有香港本土記憶的事與物。雖然沒有數據或證據支持說所有香港人都把香港視作重要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定眼下不少香港人——確實與五六十年代或更之前在香港生活的人不同<sup>12</sup>——會視香港為特別的「地方」。

對於香港人身分認同，以及香港作為「地方」而發生的更具影響力的事，可能是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運動。此時此刻不是一個適

合的時間總結反修例運動帶來的影響，因為相關的一切事件仍在發生，甚至只是開始——香港人所熟悉而習慣的香港會慢慢地消失，換了新秩序上場。不過，這些以現在進行式和將來式發生的事，不會妨礙對已經發生的事的理解和詮釋。很明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催化了不少人的香港認同，讓香港市民願意挺身而出反抗既有秩序；同時反映香港人對很多舊有的機制和運作表達不信任。上述所指的轉變，可以從民意調查數字、文化創作，甚至移民人數等方面得知，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輕易地察覺的事。

以移民為例，歷史上的香港不是沒有出現過移民潮，最為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始於八十年代，中英兩國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由於香港前途不明，加上其後發生「六四事件」，不少港人選擇離開。不過，當時的移民潮並沒有怎樣出現關於「離散」的討論，也就是沒有如何在離開香港後仍然保有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討論。但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及一系列事件所帶來的移民潮卻開始了港人與離散相關的討論，亦有部分被迫流亡的人士，仍舊公開表達對香港事態的關心，並表明不會放棄為香港人爭取權利（雖然這些行為一律被視作違反國安法）。不少海外港人開始建立海外港人組織，創辦與香港相關的刊物<sup>13</sup>，甚至有人嘗試成立影子議會等等；這些海外港人的舉動與八十年代的港人移民非常不同，很明顯有「離開了香港仍舊關心香港」的表現和動力。

不論哪一個勢力嘗試否認，甚至壓抑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或是對香港這地方的特殊認同，都應該很難否定，此時此刻的香港人以及香港的確有了一種與過往不同的認同感，以及從其中產生的價值觀。有了上述這些身份認同和對城市的認同，才有「記憶香港」的需要和討論。若不是有了香港人對香港這城的執著與認同，也不用討論可以怎樣記憶香港，以及「記憶」對現在的香港人有什麼意義。

## 二 | 記憶的曖昧

雖然人們習以為常地記憶，每天創造新的記憶，甚至同時間又遺忘很多記憶，但記憶的「習以為常」其實是極不尋常的事。人們提到記憶，可能會立刻聯想到「過去」、「過去發生過的事」、「歷史」等指涉過去的字句，不過記憶根本是很「現在」的東西，是人在此時此刻對過去發生過、存在過的事與物的記憶和理解，甚至是想像。那是記憶和理解發生於現在，卻關係過去，又會影響未來的一個過程，極之神妙。

如果能夠理解這神妙的關係，應該不難明白為什麼發生重大事件後，往往都會出現很多論述，例如兩次世界大戰爆發至今，仍舊吸引歷史學家的注意，並且著書立說，希望詮釋或解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發生的事。筆者在寫作的過程中，曾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當問到觀察2019年反修例運動發生後，不斷有屬於不同政治陣營的作者或團隊出版與反修例運動相關的書籍——包括《反抗的共同體》<sup>14</sup>——其實是不是不同政治陣營人士在「爭奪話語權」，甚或爭奪對詮釋過去和記憶的舉動？馬嶽表示因為不少香港人都留意到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之後，不同陣營學者出版書籍、刊物、文章，嘗試解釋運動為何會發生，有什麼影響，甚至要「找出戰犯」；有了相關經驗後，不能否認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出現的「出版潮」與爭奪話語權有關。

透過爭奪話語權，論者可以影響現在的人對發生過的事件的印象和記憶，而當現在的人對過去事件有記憶與印象之後，自然會影響他們當下的決定與行動。例如有輿論指責參與抗爭的人士是製造混亂，旨在破壞社會繁榮安定；另一邊廂有刊物或書籍的作者以訪問形式，記錄香港人對抗爭的看法，表達選擇支持抗爭的因由；不同立場的作品除了可以影響沒有親身經歷事件的後來者對事物的認知，可以鞏固擁有相同政治傾向支持者的立場，亦可以動搖擁有不

同立場的異見者。因為即使人的一舉一動都與記憶有密切關係，閱讀、溝通、辨別方向等各種日常事務都需要記憶能力，而人們亦非常習慣記憶的存在，但是很抱歉，記憶卻並非十分可靠。

《記憶如何對你說謊》<sup>15</sup>一書的作者Julia Shaw在書中寫到有太多事與物可以影響人的記憶。人可以因為事件過於衝擊而將一些從來沒發生過在自己身上的事，當成個人記憶的一部分；也可以因過去的創傷而遺忘曾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馬嶽也坦言，若沒有在反修例運動當下，同步記錄及寫作眼前發生的事件，並作出一定思考、分析與詮釋，就沒辦法寫出現在大家所見的《反抗的共同體》。因為一些關於情緒的感受和記憶是很即時的反應，「來得快去得快」，例如有抗爭者在抗爭現場受傷，甚至死去的消息傳出後，當下他能敏銳地察覺到香港社會及香港人的情緒，並認為那些情緒會對整個抗爭運動有非常大的影響。但若當時沒有透過寫作同步記下那種感受與社會氛圍，要在事後靠回憶進行寫作，就不太可能寫得出運動當下的種種形相和氣味，也沒辦法更立體地分析與詮釋反修例運動的經過。

文首提到自2000年保育運動風潮開始後，已經有不少人在思考討論，甚至在保存香港記憶方面有所實踐；<sup>16</sup>而2019年反修例運動及其後一系列事件所帶來的影響，令更多人（包括筆者）對於保存香港記憶有更深切的感受，甚或是有了更迫切的動力。在此時此刻的香港討論香港記憶，就像是一種本能反應，有人甚至主張這是一種道德責任。<sup>17</sup>

對於現在的香港人，以及在香港這個城市生活的人來說，其中一種重大的危機感來自，曾經習以為常的香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扭曲和劣化。記憶中那些行之有效的常識、邏輯、倫理等規範和指引都變得不再有效，甚至被另一種生活在香港的人感到陌生的邏輯取代，因此整個社會都處於陌生而且無法預測未來的狀



態。市民、商業機構、NGO等等都為此感到恐懼和失望，毅然做出撤離香港的決定。在舊有社會秩序崩潰的當下，不少人再一次思考和定義往日習以為常的香港是什麼，執意記憶「香港」這個與自己有所互動的「地方」；這既是自然而然想要劃分自身與他者的方法，也是對抗外來者的「自我防禦」本能。

在這種狀況之下，記憶又再一次變得難以定義。因為記憶是不容易分辨究竟它是屬於現在、過去還是未來的存在，甚至是否一種危險的存在。人們會透過記憶過去而否定現在，又會透過記憶過去而肯定自己的身分，賦與「香港」這個城市一些特殊的意義，甚至可能願意為之而犧牲——有別於過往的對所處城市的陌生與冷漠，同時也創造新的香港價值和身分認同。這個記憶和創造的過程，對於想要完全控制香港的政權而言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會用盡一切方法打壓，希望消滅香港人靠著記憶而建立的身分認同和價值。

### 三 | 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sup>18</sup>

因為記憶很容易受到當下影響——正如前文所述，記憶不完全等於過去發生過的事件，記憶過程中會牽涉很多「記得」與「遺忘」，既關係到現在，也影響未來，所以控制當下人們對過去事件的認知，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管控方法。從古到今都有不少類似的做法，其中一種是透過控制歷史寫作，影響人們對過去的認知，從而在當下作出相應的反應。因此，非常著名的反烏托邦文學作品，即奧威爾的《1984》（Nineteen Eighty-Four, George Orwell），故事中極權政府成立「真理部」以改寫歷史文獻、報紙、文學著作等，影響人們對過去的了解和認知，以達至維持其對社會無所不在的控制與統治目的。

對過去發生的事著書立說，提出詮釋的做法，近年亦經常引起爭論；特別是當相關作品的作者或出版機構有明顯的政治立場，更



會引來學者與相關人士的質疑。最近的例子是「團結香港基金」成立的「香港地方志中心」於2020年12月推出的《香港志》第一冊《總述大事記》<sup>19</sup>。該書推出後，引來不少香港歷史學者或研究者的批評，有專文討論該書的錯誤<sup>20</sup>，甚至有論者直接指責該書使用錯誤資料。<sup>21</sup>此外，相信《香港志》其中一個引來爭議的理由，是出版方強調《香港志》「述而不論」<sup>22</sup>，並非要進行「洗腦」工程云云。<sup>23</sup>

一如強調中立和客觀的「香港地方志中心」，十九、二十世紀由於受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影響，即是以「人」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例如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都曾經強調研究的科學性與客觀性。認為研究須以數據、檔案等相對客觀之實物作為基礎，不能強調情感或人類行為的不可預測性。在這樣的氛圍下，一直到後現代主義興起前，西方歷史學界和受到西方學術界影響的其他地區史學界，大概都認同「完全擺脫個人偏見或信仰扭曲的過去的研究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sup>24</sup>不過，八十年代後現代主義思潮出現後，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學科，大多開始探討十九世紀現代主義的觀念及其帶來的影響，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反思，可能是對於「客觀」的重新理解。

由於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影響實在過於龐雜，筆者無意於本文作深入探討，只打算以一個問題來概括：「當記憶代表真實發生過的過去，也包含個人對一件事情的看法、情緒、感受等等，由人寫作的歷史作品能否完全客觀，是完全沒有立場嗎？」面對這個問題，不論有多抗拒後現代主義，現在的歷史學家應該都會簡單直接地回答：「不可能。」因為在歷史學發展過程中，史學家漸漸發現自己可以使用的各種工具與史料（例如看似很客觀的政府機關檔案）都有不客觀的可能，甚至連作者本身都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不客觀地寫作歷史。因此，部分香港研究者對自稱「中立客觀」「述而不論」的史作存有非常大的戒心，本來就情有可原。

更「有趣」的是，當筆者以受過大學歷史學訓練的觀察角度，觀察到西方史學界對自身客觀性和中立性存疑，甚至有學者認同只有「相對歷史」，認為「歷史沒有定論」的同時，香港政府在某些事件中的表態，卻彷彿認為歷史有最終定論，也可以用行政手段來影響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和理解。最明顯的例子一定是去年香港歷史科DSE考試，因為考題要求學生討論日本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而遭撤銷，連負責試題的考評局人員也被迫離職；又例如2020和2021新學年香港中國歷史課本出現的修訂<sup>25</sup>，大概也是一種香港政府統一中學生對過去的了解作的嘗試。目前在香港除了一些軟性手段，例如具有官方立場的歷史寫作，或者政府對歷史教育內容的修訂之外，還有國安法會影響人們對過去的認知，特別是在這個眾人習慣以社交媒體溝通和傳播消息的世代。

香港政治漫畫家黃照達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發生時，正好在進行香港政治漫畫發展的學術研究。雖然反修例運動並不在其研究範圍之內，他卻開始了收集關於反修例運動的政治漫畫。他在訪問中提到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已有部分政治漫畫被作者從社交媒體上刪除，從此不再存在於網絡世界之中。他表示雖然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後，只要有註冊帳號就能發表作品，但這些作品並不如印刷品般實在。他以出版過的禁書與網絡漫畫作比較，指出某些被列為違禁品的印刷本書籍仍會有人收藏，所以仍有可能流傳後世；但社交網站上的創作以及相關的文字信息通常都不會有實物方式保存，刪除之後，可能就代表永遠消失。

黃照達認為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不少具有政治意涵的漫畫作品在不同社交網站中流傳，其實很能夠反映當下人們對反修例運動的即時反應。例如在2019年某些令香港人感到震驚的事件發生後，相關畫面會立刻成為很多畫家的創作題材，那些創作既是畫家抒發自身感情以及參與社會運動的方式，也是加深其他人對社會事件印象及記憶的方法。不過，國安法實施後，有漫畫作品被漫畫家撤下；

當白色恐怖逐漸濃罩香港整個城市，香港的漫畫家便不敢再以這城的社會事件作為創作題材。

黃照達說，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政治漫畫能反映香港人的即時反應，同時可以幫助加強記憶；因為漫畫家會繪畫新聞片段的畫面，致令那些畫面傳播得更快，更深入人心。同時也具備政治功能，例如加強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或者向世界各地民眾傳播政治信念等等；而有些畫作甚至有療傷的作用。不過當下這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已經消失，部分圖像和相關記憶甚至可能因為國安法而消逝。

行文至此，相信讀者不難發現為什麼有「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sup>26</sup>的說法。因為人類是靠記憶來連繫現在、過去與未來當最可能使用公權力的政府決定用行政手段和政策來影響人們從現在對過去的記憶，影響從現在對過去的理解時，充滿不確定性，很容易受外力影響的記憶，馬上表現得非常脆弱。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包括筆者）會在這個看似黑暗無光的時代裡，仍然想要探討「香港記憶」，因為若沒有民間自發的討論與行動，失控的公權力最終會將所有關於香港的記憶和歷史置換成最適合他們管治——或者可以說，是最適合用於殖民——的論述，到時候要再以香港人為主體，或是以香港為主體討論香港記憶，只會變得更為困難，更似是遙不可及了。<sup>27</sup>

#### 四 | 當人們想記憶香港

雖然不想過於悲觀地預測未來，但從2020年開始，不難發現香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質，特別是在抗疫一事上，公權力的荒唐走板著實嚇怕不少香港人。除了持續劣化的公共行政，亦因為不少人已經預見一國兩制的失敗，再次君臨香港的殖民政權會使香港失去過往的自由與民主，令香港的管治進一步惡化；導致更多市民和機構決定撤離香港。在這樣的情況下，離開香港但繼續保留香港身

分認同的人們會想要記憶香港，而留在香港的人們也會想要記憶過往那個相對自由的香港。雖然本文並沒有太多篇幅可以探討記憶香港的方法，但是筆者儘管提出一些記憶香港的做法，讓讀者們可以作更多的思考與實踐。

可能很多人會同意記憶是抽象的，就算是已經閱畢上文的讀者，也恐怕只會有「記憶不只是單純地等於過去」的概念。如果現在說「記憶」其實也是可以實踐的，也許是太過跳脫了，不過筆者第一個要提出的記憶香港做法正正是「實踐」。人類歷史上有過很多「實踐記憶」的群體，而基督宗教群體一定是其中之一。因為基督宗教群體就是一個藉著很多不同方式——在基督再來之前——記憶耶穌基督的生命，來確立信仰的群體。遵從教會年曆的教會生活、崇拜的禮儀和禮文、閱讀聖經等的做法，其實就是信徒在信仰生活之中實踐自身信仰基督的方式。例如每次聖餐，除了是信徒之間的連結之外，也是重新記憶耶穌基督為世人犧牲的過程。

當然，政權不會讓香港人有大規模而且公開的「實踐記憶」行動以記憶在香港發生過的事，因為這樣不但會讓香港人建立身分認同，也讓人們看清楚「過去」並非如政權想民眾理解的一套。或者這做就了自2019年往後的每個7月21日，曾經消失不見的香港警察佈滿元朗西鐵站附近，彷彿當天的元朗站不再屬於香港公眾；也只要是8月31日，香港警方都會如臨大敵在太子港鐵站出口佈防，威嚇想要在太子站外記念一些人、事、物的香港人。不過香港人還是有可以實踐記憶的方法，畢竟只要有「一小撮人」願意堅持曾經存在過那個屬於香港人的「地方」，實踐那些自身相信的生活方式，互相支持和鼓勵；一如歷史上所有曾經遭受過殖民、威權，甚至極權統治的群體與人們，總會等到長夜已盡的一天。每年的特別日子，只要香港人願意，在什麼地方，以什麼形式去記念曾經在香港發生的事、曾經發光發熱的人、遭受苦難的人，又或者令人難以遺忘的悲傷等等，其實都是實踐記憶的方式。

基督教徒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記憶香港，例如在特別的日子裡，以不同的宗教儀式記念特別的人和事，不一定須要與反修例運動有關——可以是2003年SARS疫情中犧牲的醫護人員；2012年南丫島海難的傷亡者；2020年香港出現首例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確診；2020年2月3至7日香港醫護首次發起罷工等。這些人與事，對香港社會而言都十分重要。不論是在祈禱中記念、在講道中提及、在主日學中向參加者解說，甚至成為團契和小組的主題，都是可行的記念方法。信徒作為熟悉為何要紀念基督的犧牲與復活的群體，在教會生活中記念經驗苦難的香港人和物，其實也不為過。

除了群體的紀念儀式之外，個人也可以透過創作、社區實踐等方式記憶香港。例如近年多了社區組織，正是一種記憶的實踐。好像土瓜灣故事館（「土家」），就是在市區重建局宣布將在土瓜灣展開重建計劃後，願意服務社區和嘗試留下社區記憶的港人成立的社區組織。透過組織社區工作，香港人可以操練和記憶公民社會是如何運作，也在其中發掘到不同地區的記憶。既是一種記憶香港的方式，同時是一種抵抗——對嘗試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從而將每個個體「單子化」，以達到對社會高度控制的權力的抵抗。雖然說國安法實施後，香港人的表達空間已被大幅度壓縮，但地方工作或社區工作本來就是很「生活」的，難道政府可以光明正大用法律控告訴求保留社區特色的居民，又或是指控希望開拓市民休憩生活空間是違反國安法的行為？<sup>28</sup>

創作也是很重要的記憶方式，人們可以透過樂曲、文學、攝影、繪畫各種方式來留下記憶，也用來影響記憶。前文提及的政治漫畫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記憶事件的方式；另外香港電影、流行文化、文學創作等，一直以來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們對香港的想像與記憶。近年香港出現了不少「有趣」的創作人和媒體製作，漫畫家阿塗<sup>29</sup>、YouTube頻道Captv<sup>30</sup>、戲B<sup>31</sup>、獨立歌手Serrini<sup>32</sup>等，特色是與過往香港人熟悉的電視電影運作模式不同——不是由擁有龐

大資源的公司「捧紅」，反而是透過回應日常的小議題而走進香港人視線之中。香港的創作不一定都是在回應政治問題，但可以在回應日常生活議題的過程中，成為保留香港記憶的重要載體，也讓香港人可以投射自己對香港的情感；因此在未來的日子裡，仍然希望記憶香港的人，其實可以透過創作，或是支持創作——去留意、去睇、去參與、去俾意見，藉此保留香港記憶。

文化創作、社區營造，以及宗教信仰以禮儀實踐記憶，每一樣都是有力的行動；如果行有餘力，或者可以嘗試用更多不同方法來保存香港記憶，包括歷史。可能有人認為，歷史如果不是只活在書架上的歷史書，頂多是以遙不可及的方式（例如史學理論，或是象牙塔裡的學術文章）存在；但有些時候，歷史卻可以是很細微而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事與物。

筆者在寫作的過程中，曾請教一位有多年處理及保存資源及書籍經驗的前輩。筆者向他提出個人對香港歷史的觀察，主要是關於在目前的環境下，香港歷史工作還有什麼可能。筆者起初認為，如果說「香港歷史」目前正受到威脅，可能是不太成立的說法，因為香港歷史本來就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可以說「香港史正在消失」其實是個「不存在」的議題。一直以來，香港歷史不但並非顯學（顯赫受重視的學科），專門的史學研究者亦少，甚至在正規教育體系裡也沒佔太大比例。<sup>33</sup> 因此，不應該說「香港史正在消失」，而是香港史論述正被有權力和資源的人士以別有用心方法「改造」，從教育、從更改歷史博物館展館、從出版物等等各個範疇著手，並且以前所未見的速度進行。

不過，受訪的前輩提出了另一個思考角度。他表示香港歷史研究其實跟其他與香港社會相關的學科有很密切的關係，例如要研究香港教育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等議題，往往要回顧香港歷史，所以一直以來香港史在學術層面，都與其他學科的研究有很密切關係；

而且並非沒有人在做研究，只是若以「歷史學」層面而言，並非顯學而已。這個「非顯學」的現象，使得很多與香港歷史相關的研究，散落在不同的範疇裡，而非集中在歷史學科之中，所以才會有種「香港沒有香港史研究」的感覺。

因為香港史研究散落在如社會學、教育、城市規劃、建築等學科的常態，所以其中一個保留香港歷史的方法，可以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保留可能的歷史研究材料，也就是「史料」。「保留史料」看似很困難和專業，但其實也是每個香港人都可以做到的事。受訪的前輩舉出一個有趣的例子，他表示在工作過程中，曾經有人捐贈一些飲食雜誌到工作的場館，很多人覺得那些雜誌是沒有價值的讀物，不值得收藏和保存。但他認為飲食雜誌能見證香港飲食文化的發展，也可以從中看到香港人對飲食文化的了解和看法，所以看似不入流的飲食雜誌也可以是研究香港歷史的材料。

這位前輩表示現在的人無法為未來的研究者決定他們的研究題目和內容，所以重要的是盡力保留各種不同類型的原始資料，做好相關的數碼化工作、建檔工作或是保留實體書籍和出版物的工作；這些工作是為了可能的香港歷史研究工作，也是為下一個世代保留香港的歷史和記憶。即使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可能歷史研究都被迫要「政治正確」，但又有誰能夠知道什麼時候能進行正常的歷史研究工作？因此，為以後世代留下香港歷史的原始資料，可以是這個時代的人最重要的工作。這些歷史資料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貌，政治漫畫、飲食雜誌、書籍，甚至教會週刊；這一切因為人類活動而產生的出版物在當下可能不被重視，但是二三十年之後，可能就是重要的研究材料，所以每個香港人都可以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保留與香港相關的不同物品。雖然此刻在枱面上不太適合做大量的保留項目和工作，但私人保留下來的物品總有一天會成為見證香港歷史發展的證據和珍貴文物；這就是筆者認為現在每一個人都可以為香港歷史做到的小事，也是不能被輕視的小事，因為現在沒有開



始收集和保留，也就沒有將來可能的研究。

當然現在不論用什麼方式來記憶香港都不能保證絕對安全，這時候「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則。由現在開始，每人用自己的方法，謹守自己的崗位，為每個香港的世代保留一些記憶和歷史，為世界留下香港人活動過的痕跡，都可能會在將來不知什麼時候開花結果。

## 五 | 香港記憶中的教會與教會的香港記憶

上文指出基督徒可以透過「自己的方式」來記憶香港，但為什麼香港的基督徒，或是香港的基督教有需要記憶香港？也許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就是一如「好青年茶毒室」的主張——「這是一個責任」。<sup>34</sup>

雖然基督徒並非以今生和世界為念，基督徒是寄居於現世的存在，相信有來世的生命；但不能否定基督徒的確是生存於這個世界，既然生存於世，自然就會與生活世界有互動和連繫。正如人們會與自己生活的空間有連繫，從而讓一些空間成為了「地方」，擁有與其他空間不同的意義與價值。同樣，基督徒與教會所在的空間，成為了基督徒的「地方」。我們會想要將其變得更好，更適合受造物生存，這是理所當然的，也可以是一種責任。香港教會和信徒不是一直以來都願意為改善香港而付出嗎？

1993年港島的東區醫院成立，便是很好的例子。一位要完成FYP<sup>35</sup>的大學生，透過研究並提供數據，指出香港島東區極需要一間大型綜合醫院，以縮短東區居民前往醫院就醫的時間，也減低病人在前往醫院的途中失救致死的風險。其後經過有心人數年來鏗而不捨地爭取，東區醫院在1988年動工，1993年落成正式啟用。當年積極參與爭取興建東區醫院的港人，不乏基督徒的身影，當中包括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愛華邨堂的盧龍光牧師，以及香港柴灣浸信會的朱耀明牧師。而那位以數據和調查研究催生東區醫院的大學生，正是現在廣為人知的學者陳健民博士。雖然他曾在訪問中表示自己離開了信仰和教會，但他的生命早已由水變酒，基督教的精神潛移默化於他的思考、行動與實踐之中。<sup>36</sup>

人與地方的關係，並非單向，而是互動的，只有在教會願意與地方及其上的人建立關係，教會才會成為那個地方的教會；信徒與教會才得以確立他們在該地方的存在。例如，香港基督宗教信仰徒人口在比例上並非多數，但社會人士仍然會尊重教會和信徒的聲音，原因是教會和基督徒在香港開埠以來一直因應時代的需要，透過多種服務社會的方式與社會互動，成為了香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很多香港人對基督教會的記憶與印象，是建基於教會的慈惠工作和辦學。時至今日，在辦學與提供服務均開始受到極多政治制肘的時代裡，教會當然不能只顧沉緬於往日的光輝之中，而是更要尋找更多與香港社會同在及互動的可能。與香港社會一同記憶香港是一個可能，與香港人同悲同喜是另一個可能。

2014和2019年兩次大型社會運動，或者可以引發基督徒有更多思考。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有兩間教會予人印象深刻的對比，一間是位於金鐘的教會，在門口貼出告示，指教會為私人地方，廁所不會外借；另一間是位於灣仔的教會，全日開放讓有需要人士可以入內休息。前者讓人覺得信徒不問世事，只是在小圈子裡用信仰包裝自己的自私群體，後者則令人覺得信徒願意與香港人同在，實踐信仰。這兩種對基督徒的看法，不單延續至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也正是現今香港社會普遍對教會的兩種看法；而且是很多信徒決定加入或離開教會，甚至持守或背棄信仰的理由。一位實習學生以「年輕信徒為何留／離開教會」為他的研究題目<sup>37</sup>，他從訪談中得出的分析，是已離開教會的年輕信徒基於發現其堂會不願意參與社會運動，違反了牧者常常提到要「行義」的教導，為教會「講一套

做一套」而感到失望，所以離開了所屬的教會。

當然，教會不必然要積極參與政治。不過，若教會能按著社會人士不同的需要，一視同仁與他們同在，例如提供休息的空間予有需要的市民享用，需要安慰的時候與他們同悲，其實就能夠讓市民感受到教會的同在。這方面，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已經作過很好的示範。香港堂除了在日常中午開放空間讓在附近上班的職員可以進內休息和進食<sup>38</sup>，在遊行期間都開放給遊行人士來喝杯水、抖一抖；就是當值的警員也不例外。<sup>39</sup> 這種一視同仁，與有需要的人同在，提供方便的態度，才是基督宗教參與社會的時候的應有表現，因為教會向他人展示了她會如何將善事作在最小的弟兄姊妹身上，愛鄰如己。

在這個人們被逼要直接面對強權，禮崩樂壞，國際局勢風雲變色的時代裡，每個人都會驚覺自己原來所能做到的事情實在太少；而同時，實踐信念的代價卻極為巨大。在此時此刻仍然願意與香港人同在的教會，最能夠展示其「在」的決心，同樣，需要付出的代價可能也極為龐大。只是，若教會主動記憶香港，與香港人同行，甚至可能同受苦難，體現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這才算是真真正正的香港教會，成為這城切實不可割的一部分。雖然不容易，仍然可以做的卻不難，前文已提及，教會仍舊可以祈禱、講道和小組團契的內容與香港人一同記憶香港。教會要秉持聖經的教導，一則持守公義，二則服侍鄰舍。

注釋

1. 如果對法國歷史感興趣的讀者，可能很快已經發現到今期《守望牧職》題目，與法國史家皮耶·諾哈所編的重要法國歷史著作中譯本名字《記憶所繫之處》相同。不過本文並沒有要從歷史學的角度分析香港。皮耶·諾哈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台灣：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2. 保護海港協會於2003年因質疑中環灣仔繞道工程所涉及的填海面積過大，引用《保護海港條例》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不過最終在2005年終審法院裁定政府勝訴，工程可以繼續。
3. 2004年，香港政府計劃重建灣仔利東街，開始收購當區業權，最後在2006年完成收購利東街所有業權，並且正式「清場」，清拆舊有的唐樓，重建成新住宅樓宇。
4. 原本位於中環的皇后碼頭因政府規劃填海發展而預定於2006年清拆，其保育抗爭於2006年左右開始發酵，於2007年被清拆，在過程中，不少專業人士、學界、政治人士都積極參與其中，嘗試保留皇后碼頭，不過最終抗爭失敗。原本，在抗爭過程中香港政府承諾會有相關的「保育」方案，但至今仍舊完全沒有重置皇后碼頭行動。
5. 2009年，香港政府決定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因而需要清拆石崗錦田公路旁的橫台山菜園村，從而引來一系列的保育與清拆的衝突，不過最終高鐵工程仍然繼續，並於2018年通車。
6. 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灣：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7. 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21。
8. 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59。
9. 畢竟民意調查的結果是實實在在的數字而非論述。無可否認對於現代人而言，數字有莫名的說服力，連香港特區政府在面對反對聲音的時候，也習慣要支持政府陣營的辦簽名運動，彷彿那些數字就能確立政府施政的合理性。
10. 〈市民身分認同：身分類別認同－「香港人」(按年齡組別)〉，香港民意研查所，<https://www.pori.hk/pop-poll/ethnic-identity/q001-hongkonger.html>。
11. 例如近年興起的網絡銷售平台「士多」便曾經主打香港製造的產品而打響名聲（先不論其開辦者在後來政治事件中的表態使其平台被列為「藍店」），另外還有不少本地釀造酒品、調味料、麵食等商戶都是以香港製造作為品牌特式，吸引不少人購買。

注釋

12. 這可能與香港的人口結構變化也有關係。50、60年代香港的戰後嬰兒潮，再加上港英政府因為50、60年代中國政治不穩而決定不再像戰前一樣容讓人們自由通過香港與中國的邊境，過往中國人可以自由流動，從中國到香港工作或是從香港回鄉的情況不再，所以1971年人口普查發現在香港出生人口總數，第一次超過非本地出生的人口，開始有很大數量以香港為家，慢慢與「鄉下」關係不密切的香港人出現。
13. 例如一份由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前本民前召集人黃台仰、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崑陽、《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等人創辦的刊物《如水》，相關報導可見於：〈【專訪】海外港人雜誌《如水》創刊 冀成想像香港共同體素材〉，網址：<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80357>。
14. 馬嶽：《反抗的共同體：二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台灣：左岸文化，2020）。
15. Julia Shaw著，鍾沛君譯：《記憶如何對你說謊》（台灣：商周出版，2016）。
16. 自2000年保育風潮爆發後，近十多年香港有不少地區組織興起。社區導賞團、社區保育組織、地區報等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並且默默於社區推動相關工作，比較有名例子有土瓜灣故事館（土家）、薄扶林村社區檔案館等。
17. 好青年茶毒室：《帶本哲學書上街去》（香港：好青年茶毒室，2020），頁315。
18.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出自喬治·歐威爾的經典作品《1984》。
19. 丁新豹、陳佳榮、劉智鵬等編：《香港志》〈總述大事記〉（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
20. 例如有程翔所寫的〈《香港地方志》失實偏頗〉，網址：<https://bit.ly/2OgHS8h>。另外，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邢福增教授，亦曾在其社交媒體網站中表示，《香港志》中對香港崇基學院的創辦過程的描述有誤，網址：<https://bit.ly/3t1HDN9>。
21. 《尋找美人魚楊秀瓊——香港一代女泳將抗日秘辛》的作者潘惠蓮在《香港志》出版後，於網誌澄清香港志關於楊秀瓊的記載有誤，可參閱：〈耗7.8億香港志爆失實醜聞 訛傳港產女飛魚生平 研究者公開割席〉一文，網址：<https://bit.ly/3vdcJTZ>。
22. 可參閱〈團結基金《香港志》出首冊 稱「述而不論」無意洗腦〉一文，明

- 報，網址：<https://bit.ly/38qkz2M>。
23. 近年，香港社會確實有很多「政治中立／非中立」的討論，彷彿只要用「中立」、「客觀」等名詞來包裝自身的言論與做法，就能撇清責任，也能用於強調自身並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和目的。
  24. 莎拉·瑪扎：《想想歷史》（台灣：時報文化出版，2018），頁342-343。
  25. 例如2020年8月便曾經有〈初中生須學「港自古是華領土」 新版中史書滲政治任務〉的報導，記者發現2020-2021年度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有明顯的更動。網址：<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517/KYVPNORAIMLIDT52XOWBWPJT/I/>
  26. 同注17。
  27. 其實自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很多政府發佈的新聞稿和影片，都會定義一些抗爭行為是「暴力」、「暴動」、「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經濟」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這都是正在以官方權力來定義市民行為的嘗試，對一些不懂思考社會脈絡或者不熟悉香港社會脈絡的人而言，可能官方的「一槌定音」就會變成他們對2019年發生過所有的事情的理解，這自然就會成為了他們的記憶。
  28. 不過在某些國家，擁有「與政府不同的主張」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舉動，可以只是想法或是說法，還沒實踐就已經是一種危害，筆者也不能保證，社區工作不會成為一種罪行。
  29. 香港漫畫家，其漫畫創作多與香港時事、廣東話相關，可見於其營運的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Artohk>。
  30. 以廣東話為創作語言的Youtube頻道，作品通常以輕鬆搞笑的方式來回應香港當下的時常議題，可見於其Youtube頻道：<https://www.youtube.com/c/CapTVHK/featured>。
  31. 同樣是以廣東話為創作語言的Youtube頻道，由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歐陽偉豪（Ben sir）營運，[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3dOYwF9gQ\\_tZ3SUM51cEw/featured](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3dOYwF9gQ_tZ3SUM51cEw/featured)。
  32. 獨立歌手，曾獲得多個音樂頒獎禮獎項，歌曲內容多變，多以廣東話填詞。
  33. 與筆者在台灣求學的經驗比較，多年以來香港高中課程及專上課程中均沒有必修的香港歷史課程內容，相較之下台灣的教育制度裡有必修台灣史課程內容，兩地對本土歷史的重視程度本來就有別。
  34. 見注17。

注釋

---

35. 即Final Year Project，香港中文大學中其中一間書院「崇基學院」的對其書院學生的畢業要求。
36. 〈「我的生命已由水變酒」 陳健民的信仰與實踐〉，訪問、整理：邢福增，刊於《時代論壇》，2019年3月22日，網址：<https://bit.ly/3l7APuy>。
37. 可收聽香港基督徒學會的Podcast節目〈永利901〉的EP5「為什麼他們還在教會？」，網址：<https://anchor.fm/hkci/episodes/EP5-emvcib>及<https://anchor.fm/hkci/episodes/EP5-en1k3g>。
38. 不過自2020年疫情爆發生，暫時取消了開放政策。
39. 2009年，香港爆發豬流感，灣仔維景酒店內人士需隔離檢疫，當時香港堂借出大堂予警方相關人士休息，可見於：<https://www.police.gov.hk/offbeat/895/chi/bottom.htm>。



# 守 望 牧 職

《守望牧職》是新計劃「守望牧職」的其中一種實踐。事緣在「反送中」過程中，學會除了直接參與外，也思考如何支援教牧同工反思他們在社會的角色。就此，我們定下幾個目的：第一，為教牧同工提供對社會事件有厚度的認識，特別是神學和基督徒參與；第二，組織和推動教會與社區對話，甚至尋找合作可能；第三，探討不同教會的社會參與個案，豐富對牧職的想像。《守望牧職》正是以文字來實踐這三個目的。

因疫情緣故，其他實踐計劃將稍後落實。

學會每年財赤達五十萬，但沒有影響我們放慢使命。我們仍努力投入建立一個讓人有尊嚴的社會，並支援教會回應上主的使命。我們需要你們的同行。你們一句打氣的話、一點金錢的捐助是我們動力之一。

---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 — 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或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Ltd.

請將劃線支票連同姓名及聯絡方法寄往本會地址，或直接存入支票並通知本會。

- 銀行入賬 — 香港滙豐銀行，戶口號碼：196-035927-001。

請將入數紙連同姓名及聯絡方法透過whatsapp (93520864)、電郵或傳真通知本會。

---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 9/F 901室

電話：(852) 2398 1699 | 傳真：(852) 2787 4765 | 電郵：info@hkci.org.hk

凡捐款港幣100元或以上，可憑捐款收據申請減免稅款。

守望  
牧職